

引文格式: 何桢.《马可波罗行纪》锡兰及马八儿篇探析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5): 109-116.

《马可波罗行纪》锡兰及马八儿篇探析

何桢

摘要:《马可波罗行纪》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享誉世界的东方见闻录,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可波罗行纪》的第3卷记述了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各地情况,其中以锡兰、马八儿篇记载最详。以锡兰篇为例,将其与相近时期其他文献对勘,《马可波罗行纪》第3卷的真实性及史料价值自现。结合相关研究,能够进一步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元代航海家亦黑迷失率领使团开通商路,求取佛钵、舍利的过程;二是马可波罗到达锡兰及马八儿的时间;三是马可波罗返乡加入的使团取道马八儿前往伊利汗国的内在原因。《马可波罗行纪》第3卷从中世纪欧洲人的视角,呈现了元代海上贸易及交往的繁荣场景,是当代深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可忽视的珍贵文献。

关键词: 马可波罗; 锡兰; 马八儿; 伊利汗国; 不阿里

作者简介: 何桢,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中图分类号: K919; K247; I106.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5.012

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一经问世,就成为广受关注的著作。《行纪》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从成书起一直争议至今。《行纪》关于蒙古帝国特别是其元朝统治区域的记载,因为篇幅较长,历史信息丰富,往往成为研究讨论的焦点。《行纪》的第3卷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东非及西亚沿海地区,由于其叙述较为简略,以往国内有关研究相对少一些。其实,《行纪》第3卷真实呈现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风貌,其中尤以锡兰和马八儿的记述最为详尽,弥补了其他历史文献的空白,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探讨。

一、《行纪》锡兰篇主要参照史料及其成书时间

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古时也称“狮子国”“僧伽罗国”,与印度次大陆东南隔海相望,属海上交通要地,自古与东西方颇多往来。在《汉书》《梁书》《宋书》等正史以及东晋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等游记中均有记载。

12世纪西班牙图德拉地区的犹太拉比本杰明曾在其旅行记中提到了锡兰甚至中国,但从其内容看,本杰明是否真正到过锡兰及中国尚待考证^[1]。13世纪的前70年,随着蒙古势力向西扩张,通过中亚陆路往来并留下旅行纪录的人士很多,诸如全真道士丘处机、契丹人耶律楚材、波斯人志费尼、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法国教士鲁布鲁克、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等。

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自威尼斯启程前往中国,于1291年从泉州循海路返回意大利,完成了分别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实现洲际旅行的惊人壮举。马可波罗返乡后参加海战被俘,被关于热那亚监狱中。《行纪》是他主要凭记忆追述,由狱友比萨人鲁斯蒂谦笔录而成的,全书完稿于1298年^{[2]11}。《行纪》的第3卷是涉及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部重要文献,内容包括东起日本、西至东非及波斯湾沿海诸地风土人情及物产风貌,其中以锡兰和南印度马八儿地区的记载最为详细。

在《行纪》成书之后百年间,同样涉及锡兰和印度的史料还有《鄂多立克东游录》《岛夷志略》《伊本·白图泰游记》《瀛涯胜览》诸书。《鄂多立克东游录》由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口述于1330年左右^{[3]29}。《岛夷志略》创作于1349年(至正九年),最初作为附录编入吴鉴修撰的《清源续志》,其作者是江西南昌人汪大渊^{[4]201}。《伊本·白图泰游记》是由摩洛哥苏丹秘书伊本·朱赞根据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见闻记录编纂而成的,成书时间为1356年^{[5]27}。《瀛涯胜览》初稿创作于1416年(永乐十四年),作者马欢曾以通事(即翻译)身份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6]3}。就成书时间而言,这些文献距《行纪》最近的相差30年左右,最远的相差120年左右,并不算久远,因此相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或比较。

二、《行纪》锡兰篇与其他史料之对勘

尽管包括《行纪》在内的各史料在体裁、视角及内容方面差别很大,却普遍记录了锡兰别具特色的自然环境与风俗物产,集中体现在居民与宗教、物产及饮食、宝石出产、亚当峰及其遗迹四个方面。现摘录各书原文列表比较(见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马可波罗所述的锡兰岛风土人情与其他东西方旅行家的记载往往可以相互印证。比如:《行纪》提到锡兰“无麦而有米,亦有芝麻作油。食肉乳,而饮前述之树酒”,与《伊本·白图泰游记》《瀛涯胜览》的说法一致;《行纪》对当地人形貌及盛产优质苏木的记录,也均有其他材料证实。

第二,《行纪》全书有从贸易角度记录各地特产的偏好,锡兰篇也不例外。《行纪》与各史料一致提到了锡兰产的名贵宝石,但马可波罗更进一步记录了元世祖忽必烈遣使礼求锡兰宝石的轶事,这也表明《行纪》并不仅仅是所谓的“波斯贸易指南”。

第三,在13—14世纪,尽管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政权以及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国先后控制了印度南部,并对隔海相望的锡兰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佛教仍然是在锡兰占支配地位的宗教。《行纪》对于锡兰佛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状况的记载,准确地反映了史实。

第四,海拔2243米的亚当峰,历来被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奉为神山^[7]。《行纪》对于亚当峰作为佛教徒纪念释迦牟尼和穆斯林朝拜先知亚当之所,以及需援链攀登的描述是准确的,并为其他史料所证实。不过马可波罗对释迦牟尼生平的记载有欠准确,且后文又将佛祖遗物混淆为亚当所留^{[2]378},可能是受限于宗教知识或记忆有误,但已属难能可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证明《行纪》锡兰篇的记载相当详细准确,并与其他文献形成了互证。针对这些典籍的深化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古代斯里兰卡的历史面貌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中的重要地位。

表 1 《行纪》锡兰篇与各史料对勘表

史料	对勘部分			
	居民与宗教	物产及饮食	宝石出产	亚当峰及其遗迹
《马可波罗行纪》	彼等是偶像教徒，裸体往来，仅掩盖其下体而已。 ^{[2]376} 然若需要士卒，则募别一国之回教徒为之。 ^{[2]376}	饶有苏木，世界最良者也。 ^{[2]376} 无麦而有米，亦有芝麻作油。食肉乳，而饮前述之树酒。 ^{[2]376}	兹请不言此事，请言世界最贵重之物。应知此岛所产之红宝石，他处无有，仅在此岛见之。岛内亦有蓝宝石，黄宝石，紫晶，及其他种种宝石。……大汗曾遣使臣礼求，请将此宝石售出，请之甚切，致愿以任何城市易之。国王答言，此宝祖先传留，无论世界何物皆不足以易。 ^{[2]376}	尚应知者，锡兰岛中有一高山矗立，除用下一法外，难登其巅：此岛之人系大而巨之链数条于此山上，行人攀链以登。回教徒自称此山乃是元祖阿聃（Adam）之墓。然偶像教徒，又断言是为世界第一偶像教徒葬身之所，其名曰释迦牟尼不儿罕（Sagamoni Borcam），据称是一大圣人。 ^{[2]376} 尚应为君等言者，回教徒自远道来此巡礼，谓其是阿聃。偶像教徒亦自远道来此巡礼，如同基督教徒之赴加里思（Galice）朝拜圣雅各（St. Jacques）者无异，据云确是王子如前所述，而今尚存山中之牙发与钵，确是圣者释迦牟尼之物。 ^{[2]377}
《鄂多立克东游录》			那里掘出最好的红宝石；也有上等钻石和其他许多珍宝。水流入海处找得到上等珍珠。故此俗话说这位国王的宝石比世上任何其他国王的都要多。 ^{[3]60}	此国还有一座极大的山，据人说亚当就是在上面哀悼其子达一百年之久。 ^{[3]59-60}
《岛夷志略》	（土人）聿然佛家种子，寿多至百有岁者。 ^{[4]236}	产红石，土人掘之。 ^{[4]236}	叠山环翠，洋海横络。其山之腰，有佛殿岿然，则释迦佛肉身所在，民从而像之，迨今以香花烛事之若存。 ^{[4]236}	
《伊本·白图泰游记》	全城的税收都是供佛的香火经费。庙内居住的人和过往的行人的开销，都由这项经费供应。 ^{[5]377} 城外有谢赫奥斯曼·设拉子清真寺。 ^{[5]374}	岛上的苏木也很多。 ^{[5]373} 他们的待客饭是水牛犊肉，那是在当地森林中猎捕的，捕来还是活的。还送来大米、奶油、鱼类、鸡和牛奶。 ^{[5]374}	奇异的宝石是红宝石，只此地才有，出自港湾者最为名贵。有的是挖掘而得，锡兰岛全境皆产宝石，所有矿区都有产生。 ^{[5]375}	遥望岛上的赛兰迪布山峰高插入云，状如烟柱。 ^{[5]373} 它是世界高山之一。……去脚迹处的山路有二：一称为父亲路，另称为母亲路。父亲、母亲，即阿丹、哈娃二先知。……前辈人在山上凿出石阶，边立铁桩，上系铁链，便于攀登。 ^{[5]376} 珍贵的脚迹，是我们的始祖先知阿丹留在一块黑石上的脚印，那石头位于一广场内。先知的脚踏进石内，脚印处显得低凹，长为十一拃。 ^{[5]377}
《瀛涯胜览》	国王系锁俚人氏，崇信释教，尊敬象、牛。 ^{[6]46} 男子上身赤剥，下围色绿手巾，加以压腰，满身毫毛俱剃净，止留其发，用白布缠头。 ^{[6]48}	无酪酪、牛乳不食饭。……米谷、芝麻、绿豆皆有，唯无面麦。椰子至多，油、酒、糖、饭，此物做造而食。 ^{[6]48}	此山内出红雅姑、青雅姑、黄雅姑、青米蓝石、昔刺泥、窟没蓝等一切宝石皆有，每有大雨冲出土流下沙中，寻找则有。 ^{[6]47}	王居之侧有一大山，侵云高耸。山顶有人脚迹一个，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余，云是人祖阿聃圣人，即盘古之足迹也。 ^{[6]47}

三、元世祖遣使求取佛钵、舍利的地点和过程

《行纪》锡兰篇还记载了1284年元朝使臣前往锡兰求取佛祖释迦牟尼佛牙舍利及佛钵的重大宗教事件，并描绘了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城以庄严仪式加以迎接的盛事。抄录如下：

嗣后大汗闻此山中有元祖阿聃之墓, 而其所遗之牙发, 供食之钵尚存, 于是欲得之, 乃于一二八四年遣使臣往。使臣循海遵陆, 抵锡兰岛; 入谒国王, 求得齿二粒, 甚巨。并得所遗之发及供食之钵, 钵为绿色云斑石(porphyre)质, 甚美。大汗使臣获有诸物后, 欣然回国复命。及至大汗驻蹕之汗八里城附近, 命人请命于大汗, 如何呈献诸物。大汗闻讯大喜, 命人往迎阿聃遗物。于是往迎并往致敬者人数甚众。大汗大礼庄严接受之。相传此钵颇有功效, 置一人之食肉于其中其肉足食五人。大汗曾面试之, 果验。^{[2]378}

《行纪》提到的元世祖使臣应该是元代航海家亦黑迷失。《元史·亦黑迷失传》一共有亦黑迷失4次海外出使和1次远征爪哇的记载, 其中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第3次出使僧伽刺国(锡兰)和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第4次出使马八儿国原文如下:

二十一年, 召还。复命使海外僧迦刺国, 观佛钵舍利, 赐以玉带、衣服、鞍辔。……

二十四年, 使马八儿国, 取佛钵舍利, 浮海阻风, 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 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 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8]826}

1284年, 亦黑迷失出使锡兰, “观佛钵舍利”; 1287年, 转而出使马八儿国, “取佛钵舍利”。马八儿国在印度东南沿海科罗曼德海岸, 与锡兰隔海相望。“观”与“取”居然不在一处, 且取到与否言之不详, 反而转言获取良药、紫檀。按说, 佛祖舍利世所罕见, 历代锡兰国王更将之视作王权正统的信物, 锡兰舍利入元如此重大的事件, 《元史》全篇除《亦黑迷失传》外竟然再无片语涉及, 很不寻常。

元朝使臣是否取得佛宝, 其他史料则说法不一。按《岛夷志略》所载, 尽管元朝三次遣使求取, 但最终连佛钵也未曾离开锡兰。“其佛前有一钵盂, 非玉非铜非铁, 色紫而润, 敲之而有玻璃声, 故国初凡三遣使以取之。”^{[4]236}

而元代佛教典籍《佛祖历代通载》则与《行纪》说法接近, 不仅佛钵、舍利被进献至元大都, 而且元世祖确实曾下令隆重礼迎:

天竺进钵, 帝取食前珍味, 碎置钵中。内外侍从数满千人, 各赐一粒, 普令得沾如来钵中之禅悦。

外邦贡佛舍利, 帝云: “不独朕一人得福。”乃于南城彰义门高建门塔, 普令往来皆得顶戴。

帝每斋日, 以南天竺佛钵, 置七宝珍羞。澄湛观心, 广修供养。^[9]

上述“天竺进钵”一条与《行纪》“相传此钵颇有功效, 置一人之食肉于其中, 其肉足食五人。大汗曾面试之, 果验”^{[2]378}说法应有关联。这表明, 马可波罗此处看似传奇般的记载, 却并非无中生有。

学术界历来对亦黑迷失求取佛钵、舍利的地点和结果没有定论。杨志玖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是把锡兰和马八儿两地混同了, 但《行记》内容与《元史》所记相差无几^{[10]26-27}, 可惜并未进一步详论; 陈得芝认为“观”与“取”佛钵、舍利都在锡兰, 并认为亦黑迷失与马可波罗出使时间相吻合, 值得注意^[11]; 斯里兰卡学者索必德也认为“观”与“取”均发生在锡兰, 并推测元廷仅取回观瞻, 事后又奉还锡兰^[12]。

其实, 《元史》所载1287年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而不是锡兰“取”佛钵、舍利, 并不是误记。马八儿, 元人也称“西洋国”, 史称“潘迪亚王国”, 于1279年攻灭朱罗王朝(古称“注鞞

国”）后崛起，为泰米尔人政权^[13]，是当时印度南部支配性的力量之一。1272—1284年，统治锡兰的国王是布伐奈迦巴忽一世。他于1284年前后逝世，锡兰遂进入一段没有国王的混乱时期^[14]。在此期间，潘迪亚王国的入侵军队掠走佛牙舍利，将之带回南印度^[15]。1284年，亦黑迷失在锡兰“观佛钵舍利”；1287年，他再次出使求取圣物时，佛牙舍利正好不在锡兰而在马八儿。因此，《元史》的记载是准确的。

索必德认为，鉴于佛牙舍利对于锡兰和南印度的重大宗教、政治意义，仅凭亦黑迷失使团不大可能完成求取任务，并且斯里兰卡、印度也没有相关资料佐证。因此，他进一步推论，亦黑迷失使团求取到的可能只是佛祖圣物的复制品，本文予以认同。不过，索必德关于元廷取佛钵、舍利而复还锡兰的观点，既无材料佐证，也非常理。

亦黑迷失未能求得佛祖舍利及佛钵原物，这就可以解释他“大功告成”后并未立即奉宝物返回，仍驻留当地“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8]826}的异常举动。佛牙舍利被护送至大都后，元世祖也确实曾对其真伪存在过疑问。“帝问僧佛牙真伪，僧无对。帝云：‘真伪自分明。诸人休错解。’”^[9]

随后由于南洋通使频繁，佛钵、舍利真伪很快真相大白。亦黑迷失1287年取佛钵、舍利返回后即获升迁，之后他虽屡献珍异之物，但直至元世祖逝世也未再获荣宠，当与此有关。这可能也是《元史》对于取得佛钵、舍利之后的情况记载阙如的原因，而《行纪》对此事的记载是国外文献中的孤证，非常难得。

四、马可波罗到访锡兰、马八儿的时间

马可波罗有时称锡兰为“印度锡兰岛”^{[2]377}，将其视为印度区域的一部分。《行纪》第一次提到马可波罗的印度之行，是在忽必烈朝廷中遇见伊利汗国使者之前，这个使团的任务是为伊利汗阿鲁浑迎娶一名新王妃。《行纪》记录了马可波罗一家加入该使团的过程：

会东鞑鞑君主阿鲁浑之妃卜鲁罕（Bolghana）死，遗命非其族人不得袭其位为阿鲁浑妃。因是阿鲁浑遣派贵人曰兀刺台（Oulatai），曰阿卜思哈（Apousca），曰火者（Coja），三人，携带侍从甚盛，往大汗所，请赐故妃卜鲁罕之族女为阿鲁浑妃。

三人至大汗所，陈明来意。大汗待之优渥，召卜鲁罕族女名阔阔真（Cogatra）者来前。此女年十七岁，颇娇丽，大汗以示三使者，三使者喜，愿奉之归国。

会马可阁下出使自印度还，以其沿途所闻之事，所经之海，陈述于大汗前。三使者见尼古刺玛奚马可皆是拉丁人，而聪明过人，拟携之同行。缘其计画拟取海路，恐陆道跋涉非女子所宜。加以此辈拉丁人历涉印度海诸地，熟悉道路情形，尤愿携之同往。^{[2]29-30}

1941年，杨志玖对《永乐大典》卷19418所引《经世大典·站赤》一段公文进行了考证，认为公文中前往伊利汗国的使团，就是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加入的护送阔阔真王妃的使团。他还进一步推论出该使团于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从泉州离华^{[10]38-39}。此段公文原文如下：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10]38}

从上文可知,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三月,使团在大都奉旨后南下泉州,但直至八月仍未出海。那么,马可波罗在大都遇见伊利汗国使者的时间,必不晚于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则至元二十六年即1289年,他应尚在印度。马可波罗等人“历涉印度海诸地”,《行纪》锡兰和马八儿篇的记载又如此详细,他的印度之行所到之处应包括两地。《行纪》在提到圣徒托马斯在马八儿国“显灵”事件时,指出发生时间是1288年^{[2]389}。此事虽可能是马可波罗听人转述的传闻,却也可佐证他在1288年或之后不久到过马八儿。

《行纪》提到的第二次印度之行,即1291年年初,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随伊利汗国使团自泉州出发,取道马八儿前往波斯。因护送王妃任务紧要,使团在到达印度前除在苏门答腊躲避风浪停留5个月外^{[2]368},应未在沿途过多停留,所以《行记》对这一段路程的记载也相当简略。则该使团应在1291年年底,或1292年年内到达马八儿国。

因此,马可波罗到访锡兰、马八儿一带的时间应是1288—1289年出使印度、1291—1292年左右前往伊利汗国途中。

五、马八儿成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成因

从泉州取道海路前往西亚的路途长达万里,有多条航线,停靠的港口也不止一处,为何早在使团出发前,就已经确定必须经过马八儿前往伊利汗国呢?这其实并非偶然,揭示了马八儿在元代前期海上贸易及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史》记载,元世祖一朝自1279年(至元十六年)起,与马八儿之间的往来不下14次^[16],在南亚诸国中称冠。此外,马八儿几乎成了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海路往来的必经之地。晚至1304年(大德八年),伊利汗国使臣那怀向元朝朝贡仍取道马八儿^[17]。

马八儿在元世祖一朝能够成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不仅缘于其在印度南端的特殊地理位置,更是与当地有利的政商环境有关。马八儿国与元朝之间的友好往来,以不阿里为代表的官商集团贡献最巨。不阿里,时任马八儿宰相,出身穆斯林商业家族,世祖末期受召来到中国,于1299年(大德三年)逝世。其事迹以元刘敏中为其撰写的《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为最详,《元史》世祖、成宗本纪及马八儿传也多处提及。陈高华在《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一文中,引入朝鲜郑麟趾《高丽史》有关材料,进一步弄清了不阿里的生平问题^[18]。刘迎胜在《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一文中提出,不阿里虽身为马八儿宰相,但出身回商,清楚蒙古帝国势力遍及东亚及中东地区,从自身利益出发,力图推动马八儿与元朝往来,甚至不惜得罪马八儿最高统治者^[19]。

不阿里更大的功绩是帮助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串联起了海上交通。《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提到他“复通好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凡朝廷二邸之使涉海道,恒预为具舟楫,必济乃已”^[18]。亲王阿八合、哈散即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及合赞汗。伊利汗国统治中心虽远在波斯,但其创始人旭烈兀和元世祖忽必烈均为拖雷之子,与元廷一向联系紧密。然而自窝阔台汗后裔海都作乱后,元朝与伊利汗国均受其袭扰^{[2]433-440}。1289年,世祖为解决海都之乱甚至不惜率军亲征,然而直至逝世仍未竟功,海都之乱最终平息已经是1306年(大德十年)。在此期间,元朝与伊利汗国间的陆上往来受战争影响多次中断^[20]。因此,1291年马可波罗参加的使团改走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马八儿国前往伊利汗国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马可波罗一行到达时,不阿里尚在马八儿。《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记载了元廷遣别帖木

儿等人召不阿里来华一事。《元史》虽未提及别帖木儿等人出使的任务，却有其出发的准确时间。“（至元二十八年，九月辛酉）以别铁木儿、亦列失金为礼部侍郎，使马八儿国。”^{[8]110}乘船前往马八儿，应在每年11月至次年4月间南海季风吹向西南方向期间出行，否则其他大部分月份主要是东北方向季风^[21]。既然别帖木儿使团于至元二十八年九月从大都出发，当在至元二十八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出海，这已是马可波罗等人出发一年之后了，不可能先其到达。

凡元朝路过马八儿前往伊利汗国的使者，不阿里均会提供帮助，更不用说护送伊利汗国王妃这样重要的使团了。故马可波罗一行到达马八儿后，必然得到了不阿里等地方政商势力的接待和帮助。借此便利条件，马可波罗对马八儿政治、宗教、社会的观察非常深入，尤其是关于马八儿国“五王共治”^{[2]381-382}统治结构的描述，可对《元史·马八儿传》^{[8]1196}等元代史料进行补充。

综上所述，马可波罗加入的伊利汗国使团取道马八儿国前往波斯，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路线，而是元廷经多年经略，在马八儿国获得了以不阿里为代表的重要政商势力的大力支持，通往印度、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世祖末年较为繁荣稳定的结果。

六、余论

蒙古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一方面，带来了残酷的战争和破坏；另一方面，却间接疏通了洲际间的陆路、海上交通。大量的商人、使者、宗教人士及旅行家们借此踏上了以往令人望而生畏的漫长旅程，向着世界另一端前行。马可波罗不是元代首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行纪》也不是首份西方人撰写的东方记录，但是马可波罗通过其《行纪》奏响了那个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强音。而《行纪》第3卷所描绘的沿海各国间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繁荣景象，充分证明了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事业的历史必要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 [1] 本杰明. 本杰明行纪 [M]. 李大伟, 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457-459.
- [2]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纪 [M]. 沙海昂, 著. 冯承钧,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3] 鄂多立克. 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M]. 何高济,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4] 汪大渊. 岛夷志略 [M] // 郭超, 夏于全. 历史与史学名著: 第16卷.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9.
- [5]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 [M]. 马金鹏, 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5.
- [6] 马欢. 瀛涯胜览 [M]. 万明, 校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7] 单琳, 张茵. 斯里兰卡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93-94.
- [8] 宋濂. 二十四史: 第18册 元史 [M]. 缩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9] 念常. 佛祖历代通载 [M]. 元至正七年 (1347) 释念常募刻本.
- [10] 杨志玖. 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 [M] // 杨志玖. 杨志玖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1] 陈得芝.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 [J].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1986 (10): 1-9.
- [12] 索必德. 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 以佛教文化为中心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0.
- [13] 周运中. 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 [J]. 南亚研究, 2012 (2): 114-123.
- [14] 尼古拉斯, 帕拉纳维达纳. 锡兰简明史: 下 [M]. 李荣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465-466.
- [15] 帕特里克·皮布尔斯. 斯里兰卡史 [M]. 王琛,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37.
- [16] 马娟. 马八儿国与元朝之往来及其相关问题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33 (2): 20-25.
- [17] 陈高华. 元代的航海世家澈浦杨氏: 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 [J]. 海交史研究, 1995 (1): 4-18.
- [18] 陈高华. 印度马八儿王子李哈里来华新考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 (4): 70-73.

- [19] 刘迎胜.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M] //刘迎胜. 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 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7.
- [20] 雷纳·格鲁塞. 蒙古帝国史 [M]. 龚铖, 译. 翁独健, 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66.
- [21] 肯尼斯·麦克弗森. 印度洋史 [M]. 耿引曾, 施诚, 李隆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7.

On Chapters of Ceylon and Maabar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He Zhen

Abstract: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is a world-famous record of the east by the great Italian traveler and an importa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 exchanges.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describes the coastal area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which Ceylon and Maabar chapters are the most detailed. Taking the Ceylon chapter as an example, the authenticity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are revealed by comparing it with other documents in similar period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research, three aspects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first, the process of the navigator Yighmis leading the delegation to open a trade route and seeking Buddha's relics; second, the time when Marco Polo arrived in Ceylon and Maabar; third, the internal reason why the delegation that Marco Polo joined after returning home came to Ilkhanate from Maabar.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presents a prosperous scene of maritime trade and exchanges in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eyes of a Europea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is a valuable documen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Keywords: Marco Polo; Ceylon; Maabar; Ilkhanate; Bkhali

(收稿日期: 2022-04-19; 责任编辑: 陈鸿)